

陈思和

CHEN

思

SI

和

HE

自

跨

陈思和 著

世

纪

选

学

人

文

存

集

1. [Redacted]

2. [Redacted]

3. [Redacted]

4. [Redacted]

5. [Redacted]

6. [Redacted]

7. [Redacted]

8. [Redacted]

9. [Redacted]

10. [Redacted]

11. [Redacted]

12. [Redacted]

13. [Redacted]

14. [Redacted]

15. [Redacted]

16. [Redacted]

17. [Redacted]

18. [Redacted]

19. [Redacted]

20. [Redacted]

21. [Redacted]

22. [Redacted]

23. [Redacted]

24. [Redacted]

25. [Redacted]

26. [Redacted]

27. [Redacted]

28. [Redacted]

29. [Redacted]

30. [Redacted]

31. [Redacted]

32. [Redacted]

33. [Redacted]

34. [Redacted]

35. [Redacted]

36. [Redacted]

37. [Redacted]

38. [Redacted]

39. [Redacted]

40. [Redacted]

41. [Redacted]

42. [Redacted]

43. [Redacted]

44. [Redacted]

45. [Redacted]

46. [Redacted]

47. [Redacted]

48. [Redacted]

49. [Redacted]

50. [Redacted]

51. [Redacted]

52. [Redacted]

53. [Redacted]

54. [Redacted]

55. [Redacted]

56. [Redacted]

57. [Redacted]

58. [Redacted]

59. [Redacted]

60. [Redacted]

61. [Redacted]

62. [Redacted]

63. [Redacted]

64. [Redacted]

65. [Redacted]

66. [Redacted]

67. [Redacted]

68. [Redacted]

69. [Redacted]

70. [Redacted]

71. [Redacted]

72. [Redacted]

73. [Redacted]

74. [Redacted]

75. [Redacted]

76. [Redacted]

77. [Redacted]

78. [Redacted]

79. [Redacted]

80. [Redacted]

81. [Redacted]

82. [Redacted]

83. [Redacted]

84. [Redacted]

85. [Redacted]

86. [Redacted]

87. [Redacted]

88. [Redacted]

89. [Redacted]

90. [Redacted]

91. [Redacted]

92. [Redacted]

93. [Redacted]

94. [Redacted]

95. [Redacted]

96. [Redacted]

97. [Redacted]

98. [Redacted]

99. [Redacted]

100. [Redacted]

跨世纪学人文存

陈思

和自选集

陈思和著

“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跨世纪学人文存  
陈思和自选集  
陈思和 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36号)

桂林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889×1194 1/24 印张:15.25 插页:2 字数:352千字

1997年9月第一版

199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500册

ISBN 7-5633-2486-0/I·221

---

定价:(平)28.00元

(精)36.00元

## 陈思和

曾用笔名艾春等。一九五四年一月出生于上海，原籍广东番禺。一九八二年一月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一九九三年晋升为中文系教授，同年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点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主要研究现代作家巴金的思想创作、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和当代文学批评。著有学术专著《巴金论稿》（与李辉合著）、《巴金研究的回顾与瞻望》、《人格的发展——巴金传》、《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编年体系列文集《笔走龙蛇》、《中国新文学碎片》、《羊骚与猴骚》、《鸡鸣风雨》、《马蹄声声》；学对话集《夏天的审美触角》和《理解九十年代》。

## 丛书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元化 王铁崖 张岱年 张政烺  
李学勤 陈岱孙 周一良 季羨林  
费孝通

# 出版说明

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学人。学术所依托者，学人也。学人须由学殖养成，非纯由天资铸就。学殖者渐，天资者顿，而学术的规律是“渐”的。基于这个“渐”的规律，出版人便有义务在当代学术的积累与整理上做一份工作，以助成学术之进步。这是我们出版此丛书的初衷。

新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来，中国学术界涌现出一批新学人。他们大多有过对社会动乱与变革的体察，受过“西风”渐欲迷人眼的种种思潮的冲激，有过放眼望洋的蹈厉，亦有过躲进小楼的沉潜。他们在80年代初崭露头角，继而渐趋成熟。90年代以来，这批学人更以一种成熟的心态，对新世纪的学术前景作了从容的思考。由此我们也就有理由期望他们在步入下一个世纪的时候，成为新世纪通博的学术大家。这样的大家是现代化中国所迫切需要的。因为一个民族，在其步入现代化的时候，倘不能对自身的存在作出健全、合理的解释与肯定，那便是崩溃的开始。学人的使命，究其根本正在于作出这样的解释与肯定。我们不能在拥有了技术之后却失去了精神。这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是可堪忧心的问题。

《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中国这一批新学人，多是这样的“心忧”之人，当其激切之初，曾蹈厉

于良知的煎迫；当其冷静之余，又沉潜于学理的涵泳。这样的“心忧”，是学界的好传统，也是中国学人最可宝贵的品质。他们的学术自选集、也许不一定能呈示其学术全貌，但肯定能够突出体现其宝贵的学术品质。我们出版这套丛书，就是希望这样的品质能够在 21 世纪的中国学人身上传承下去。

“跨世纪”只是一个象征的说法，并不是说未被列入“跨世纪”的人就无权迈进下世纪的门槛。“跨世纪”只是意味着，我们对新世纪中国文化的昌明与辉煌有着多么热切的期许，以及基于这热切期许而履行的对中国文化建设重任的自觉的肩负。没有这样的自觉，便没有迎接新世纪的真正准备，也就没有了开创未来的现实基础。丛书收入的，都是人文科学研究者的著述，我们想：人类存在的价值，其终极尤须以人文的尺度来衡估。

90 年代的沉潜，也许意味着中国学术界已进入了一个转型期，这样的转型是承前、也是启后。在这个重要的时期，我们出版这套“跨世纪学人文存”，旨在尽我们的薄力，倡学术之昌明。

是为说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九七年九月



# 自序

本书所收的论文,最早一篇写于1985年年初,最晚一篇写于1995年年初,整整过去了十个年头。十年前,我刚过而立之年,有了一份大学教师的职业和一个新婚的家,从而有了一个安心读书、工作、生活的环境,于是,读书,教书,进而又写书,人生过得很平静。

从学术道路上说,我走得也很简单。从研究一个作家进而研究文学史,再进而研究知识分子的道路,大致是在一个固定的基础上逐渐扩大开去,学问是积少成多,但没有改换门庭,也没有发生过穷途之哭的事。

原先我在一个图书馆工作,工作之余多少读了一些古籍和外国哲学文学方面的书,并养成了写书评的爱好。1977年考入大学中文系,发现自己在现代文学课程方面的知识很少,就开始跑图书馆,集中时间阅读现代文学作品。当时同班同学李辉也在看这方面的书,因为志同道合,就在一起研读现代作家巴金的小说。也不是因为特别的喜欢巴金,只是觉得他早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信徒(当时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以为无政府主义是极反动的),后来成了走在时代前列的重要作家,这里肯定有些特别的现象,按当时的理论是解释不了的,于是就产生了进一步研究下去的兴趣。我们的第一部著作《巴金论稿》,主要是探讨巴金与西欧各种思想学说和文学流派的关系,为此,我们找了许多有关无政府主义的书来阅读,同时也涉及了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的书,读到后来,我们不仅对巴金有了一番新的解释,连对无政府主义也有了自己的

理解。这些阅读对于我们刚刚从拨乱反正的政治气氛下走上学术道路很有用处,至少让我们学会了遇事必须独立思考,不迷信任何理论教条的思想方法。大学毕业后,我又写作了《巴金研究的回顾与瞻望》和《人格的发展——巴金传》两种关于巴金的书,基本上仍然坚持了这些思路 and 原则。

如果说,研究巴金使我开始认识到原来那种用千篇一律的理论观点解释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教科书式思维方法的虚伪性,认识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原是有多元的价值取向可以选择而不是受制于那种僵死的所谓“历史规律”决定论,那么,我在大学毕业以后进一步对中国 20 世纪文学史的研究,更加证实了这一点。我在 1985 年提出“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以前,做过两件事,一是协助贾植芳教授编辑大型资料书《外来思潮、流派、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对本世纪初到“五四”前后的中外文学交流方面的资料有所接触;二是留校任教以来一直开设“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基础课程,复旦大学中文系有个怪现象,从一开始就没有设中国当代文学的教研室,具体什么原因不得而知,可能是觉得当代文学没有什么学问可言,附在现代文学后面也就可以了。不过这样一来倒是给我们青年教师一个锻炼机会,从上课起,就必须从“五四”一直讲到“文革”后的文学,讲了几遍以后,逐渐认识到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把它们人为地分作两个学科不但没有必要,反而妨碍了两个学科的深入发展。因为从现代文学的学科发展来看,把它封闭在 30 年的时间范围里,严重地局限了研究者的眼界,许多文学现象不通过后来的实践检验就无法展示真相;同样,当代文学的学科发展也存在这个问题,当代文学虽然在理论上是以 1949 年为起点,但其许多文学现象和源流都与整个 20 世纪文学相联系,割断了历史,许多历史现象的解释只能盲目地人云亦云。当时沟通现代文学的要求似乎在本学科研究中已经是水到渠成了,1985 年在北京万寿寺举行的青年学者创新座谈会上,北京大学陈平原等三位学者联合发表关于“中国 20 世纪文学史”的研究论文,正代表了这一研究方向,所以我关于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的一组系列研究也能在当时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这组以“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为题的系列研究,正是以“史的批评”来实践文学现象研究的尝试。1985 年曾被学术界称为

“方法年”，各种新方法、新技术都被应用到文学研究上来，我对此并不热衷，不过觉得研究方法应该取决于研究对象的需要，当我将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个领域视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时，确实感到原来文学史上的许多既定结论都发生了动摇；原来在朦胧中感到有疑问处也得到了明白的解释，为此，我把“整体观”在方法论上的意义看得比具体的学术结论更重要。

通过教学实践我还体会到，中国现代文学虽然也是作为国家教委规定的二类学科，与古代文学、外国文学同等，其实它作为一门学科的内涵是不足的，之所以会这样来设置高校的学科，是因为这门学科在50年代所包含的特定政治内涵。这样一想，我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门学科会有那么多非学术的因素，于是又加重了对原有的教科书模式的怀疑，这就有了1988年与王晓明先生联袂主持“重写文学史”的专栏。这个专栏所发表的文章现在看来并不怎样深刻和击中要害，更主要的是那些文章还没有来得及涉及对文学史理论本身的探讨，本来想先针对旧文学史的既定结论做些正本清源的工作，以求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然后吸引同行们来进一步讨论有关文学史的理论，结果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终于不了了之。有些非学术性的事情不去说它也罢，但“重写文学史”毕竟留下了积极的成果，它促使年轻一代学者更加深入更加具体地去研究文学史现象。自90年代开始，我着重研究抗战以来的文化史和文学史现象，提出政治权力话语、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和民间文化形态为当代文化建构的三大板块和战争对当代主流文化产生的影响，都可以说是“重写文学史”工作的继续。

“五四”新文学史原来一向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精神独尊的历史，而我提出“三大板块”理论，特别是民间文化形态的理论，就不能不对原来定于一尊的知识分子传统给以重新认识。这种认识变化最初产生于1989年初，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激情（一说广场意识）像孔雀开屏似的高扬出来，无意中却暴露了自“五四”以来就有增无减的思维缺陷。为此，我写了《“五四”与当代》一文，以纪念“五四”70周年为缘由，对“五四”的知识分子传统作些反思。迈出这一步，学术视野又为之一变，由文学史转向文化史的研究，像苍蝇似的，飞了一圈又飞到原来的起点上：学术对象又回到了当年研究巴金的老题目：20世纪知识分子道路

总结及其多种可能性的探索，当然现在的研究范围和研究观点是不一样的。正值其时，中国发生社会经济体制的大转轨，市场经济取代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自50年代起就被计划经济体制剪去双翼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被呼啸而至的商品经济大潮吓得目瞪口呆，久久回不过神来。对知识分子来说，除了身受经济之窘外，更惨痛的是他们对知识的信仰失落了。于是有了上海学者们关于“人文精神寻思”的连环式讨论，也有了关于“人文精神”讨论引起的争论。尽管参加讨论的成员对“人文精神”的理解并不一样，但大致能够取得认同的，就是想通过讨论来弄清楚知识分子如何调整在现代社会的位置和价值取向，讨论者有不同的参照，有的以50年代的知识分子处境为参照，有的以“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为参照，也有的以明末清初的知识分子为参照，也有的以西方后工业社会为参照，因参照标准不一样，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就无法深入下去，再加上有些嬉皮士式的辩士们故意添乱和有些卫道士们的神经过敏，这场讨论很快就像“重写文学史”讨论一样流产，不过我认为这场讨论的意义在客观上已经产生了，它直接鼓励了知识分子重新确定自己的工作岗位，进而确立自己的工作信心。

我近一二年的工作，大都是围绕了这些方面展开的。我觉得一个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知识分子的岗位，不仅仅是躲在书斋里讨生活，要做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首先要做一个现代观念的人，它的岗位应该是开放型的，应该在现代社会变动中找得到自己的立足点。著书立说、传播学说、以及将这些学术成果通过现代传媒转换为社会财富，应该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工作系统。现代学术研究不是藏诸名山的事业，更不应该是“避席畏闻”的避难所，而应该与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相适应，使人文传统不但要在现代物质文明建设过程中争得一席之地，而且要在国民精神发展中发生重大影响。有人说我们现在没有人文传统，不存在的东西也就无所谓“失落”，所以也用不着讨论。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我们现在失落了人文传统，并不说明以前就没有，也不说明将来不会有，我们身为知识分子，就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去讨论它、建构它，万事从我们自己做起，守先待后，让传统之流从我们身上淌过，再流传下去。

如果人的一生以18岁为成年，那么，回顾自己走过的足迹，从18岁到27岁，可说是黑暗中求索的阶段，从28岁起，至今又15年过去，

是在逐步走入学问之境的途中，其途也长，其境也远，人生常苦光阴短促，命运难卜，也不知自己在这条自己所选择的路上究竟能走多远。但特立独行、诚实求索，乃是自己为人作文之本，我想这路到底还是能够一步步走下去的。这本十年文存，虽然只是我的工作的一部分，但毕竟留存了生命发展过程中的点滴痕迹，于自己是有这样的意义。

十年前的今天，我发表过一篇短文，是针对当时流行的“方法论”的，也抒发了自己一向遵循的做学问原则，今从旧笈中翻出，再读之，觉得仍有点意思，录于下，以为自勉：

记得几年前，读过一篇许地山的散文。文字很美，内容也很美。写的是一个人要在暗夜里走山路，他的朋友给他一盏灯照明，他坚辞不受，说：“满山都没有光，若是我提着灯走，也不过照明三两步远，这一点光能把照不到的地方越显得危险，越能使我害怕。不如让我空着手走，初时虽觉得有些妨碍，但一会儿就什么都可以在暗中辨别了。”于是这个人在黑暗里上山了，没有提灯。朋友笑他：“天下竟有这样的怪人”。但那个人没有跌倒，也没有遇到危险，安然地到家了。

初读这篇散文的时候，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但近年来，那个在暗夜里走路的人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仿佛是一种暗示。如果说，我也算搞过一些文学研究工作，也写过一些批评文章的话，我不正像那个人一样，在暗夜里摸着走山道么？我没有灯，因为任何灯的光都是有限的，使我看不到光圈以外的东西。走过夜路的人都知道，暗夜里处处有灯。天上有星月，地上有萤火，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心去体验那暗夜，靠自己的眼睛去辨认那道路。暗夜里走惯了路的人，心中就有灯。自己就是灯。

当然，我远远达不到那样的境界。我会跌倒，弄得满脸是血，但我不后悔，反正是探索着走，我总相信，手上的灯，只能照着几步的距离，只有心中的灯，才能看透那黑黝黝的无限。

虽然灯的光有限，无法照透暗夜中的宇宙之谜，但哪怕是

照亮了几步的距离，也终究是暗夜的一角一隅。在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文明冲击下，你走夜路不想用灯还不行，——因为有路灯，有电线架在那儿。远远的电灯亮着，虽说黑夜依旧重重，足以使那微弱的灯光瑟瑟作抖。但光毕竟是有了，而且是一排。

沿着电线杆子走，大约总不会错。因为它多少为你指明了路。但是暗夜行路的一切优势也就此完了。文明，也带来局限。于是心中的灯就黯淡。

忽而有几个人，大着胆子离开了那一条让人走惯了的道路，也就是说，离开了那几根电线杆子。他们踏上了另一条荒芜人烟、荆棘丛生的小道，他们拿着手电筒，碰碰磕磕地乱闯，虽然跌过几跤，到底也依靠着手电的光走过了一段路。于是大家就喜欢，齐声赞美手电的光。

秉烛夜游的事，现在是没有了，但拿手电筒夜游的则有人在，去年暑假，我的几个学生去华山游览，就是靠着手电半夜里走过鹞子翻身，上了西岳顶峰的。过后我惊叹他们太大胆，他们却笑着告诉我：“因为是暗夜，只靠着手电的光摸路走，一点也不知道身边就是悬崖峭壁，到了白天才真不敢走哩。”

原来如此。看来手电的光并不高明。

仍然是关于灯的故事。是从一个朋友那里听来的。

一个人站在一盏路灯下，低头寻找东西。旁人走过来问他：“老兄你找什么呀！”那人说：“我的钱包丢了。快帮我找吧”。旁人也低头找了一会，说：“路灯下面没有钱包呀，你干吗还要找？”那人无可奈何地回答：“是哪，我也知道，但没有办法，我只能在光圈里找呀。”

这也许过于刻薄了。它揭示了一个无情的道理：在现代社会里，人与灯光一样不是万能的，他（它）们面对暗夜之谜，同样的无能为力。

心中的灯熄灭了。

人选择什么样的灯是自由的，可是一旦选定了一种灯以

后,他就不自由了,因为灯的光圈限制了他。就像那个在路灯下找钱包的人一样,他只能在这里找。如果你想走出光圈,那是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只好再求助于另一种灯,接受另一种光圈的限定。

人只能借助于灯光。但人又必须超越灯光。自火把到红烛,再到手电。不超越就无法使照明的工具不断地改革,不断地进步。但只要是灯,是光,就有局限。纵使太阳的光焰无际,它不也是只能照亮圆型的地球的一半么?

如果不傻,人总能发现光圈的局限,总是想突破,总是不断地换用各种各样的灯,借助不同角度、不同强度的光圈,在暗夜中寻找、摸索,或者走着山道。

当自己不能成为灯的时候,只能借助于各种人造的灯,不断地更换,也是一种超越。只要不是死死握住一盏灯就沾沾自喜,以为获得了太阳。

有两种批评方式。一种如牢牢守在一盏灯下面,在限定的范围内出色完成寻找钱包的工作,纵然光圈有限,但凝聚起来的光线照着他,使他通体生辉;另有一种如不断替换手里的灯,用完一种,就扔掉,再换一种。他从不计较自己用了多少个灯。有人问他:“你使用什么灯?”他只好回答:“不知道。”或说:“我从不关灯。”

“你说谎!”有人揭发说:“你明明用过灯,而且不止一盏。”

我也许只能在许多灯里面挑选一种,作为一个批评家的装饰。但我终究希望能获得心中的灯,我想说,我就是灯。

1995年9月25日写于虹口黑水斋

# 目 录

自序.....	(1)
中国新文学史研究的整体观.....	(1)
关于编写中国 20 世纪文学史的几个问题.....	(18)
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两种启蒙传统 .....	(31)
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现实主义 .....	(55)
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浪漫主义 .....	(83)
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忏悔意识 .....	(98)
中国新文学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及其演变.....	(118)
共名与无名.....	(139)
“五四”与当代	
——对一种学术萎缩现象的断想.....	(153)
论知识分子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	(169)
当代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	(182)
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 .....	(200)
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 .....	(226)



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寻根意识·····	(243)
当代文学创作中的生存意识	
——关于“新写实小说”特征的探讨·····	(258)
民间与现代都市文化	
——兼论张爱玲现象·····	(276)
但开风气不为师	
——试论台湾新世代小说·····	(308)
创意与可读性	
——试论台湾当代科幻小说·····	(327)
主要著述一览表·····	(345)